

全球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议程高端对话第六次会议 ——疫情新背景下中国“十四五”规划展望 线上会议专家精彩观点集锦（一）

2020年5月20日- 5月21日，由能源基金会发起的“全球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议程高端对话第六次会议——疫情新背景下中国‘十四五’规划展望”于线上顺利召开，来自中、美、欧盟、英国的50余位权威专家参与了本次会议。专家们围绕“以绿色经济振兴为背景制定‘十四五’规划，开启高质量增长的新历程”、“数字经济助力能源转型”、“新城镇化下的可持续基建投资”、“能源结构转型与电力基础设施投资”等四个主题各抒己见，广泛交流经验与建议。同时，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还介绍了“能源基金会新冠疫情背景下关于经济刺激计划及加速‘十四五’规划期间绿色低碳转型研究与交流计划”启动声明，将在2020年调配1250万美元赠款，来支持在国家层面、行业部门层面以及地方层面的研究和交流。

主办方寄语

在当前新冠疫情发展形势下，每个人都在思考如何从疫情的冲击中走出来，防止全球衰退、化危为机。从疫情后经济振兴计划的背景和契机出发，很有必要乘势推进结构调整，加快绿色低碳转型，避免形成高碳锁定效应。恰逢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历史阶段，经济体量、增长动能、能源结构和温室气体排放等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也正处在制定“十四五”规划、践行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探索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关键期，对全球未来发展进程亦有巨大影响。开放的中国需要放眼世界，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对话交流是合作的前提。希望这次系列对话能够有助于中外专家的联合探索。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主题一

以绿色经济振兴为背景制定“十四五”规划,开启高质量增长的新历程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G帕特尔经济与政府学教授，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气候变化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席，格兰瑟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给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全球经济正面临二战以来的最大风险，且崩溃程度要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为了克服贫困、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管理巨大的气候风险，全球经济复苏必须以转向强劲、可持续、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切入点，投资未来的经济和活动，将短期经济刺激与长期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相结合，增加对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投资，避免高碳锁定、搁浅资产和搁浅就业。

中国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决定了未来几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应带头在减排、需求和可持续投资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已处于新低碳技术发展的最前沿，而在更高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领域投资的刺激驱动下，中国将引导新的全球增长故事，实现巨大效益。

中国应在“十四五”期间：（1）加快向清洁能源转型，停止对煤电厂的投资，以更智能的方式平衡供需和更市场的方式提高效率，并提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同时妥善出台对煤炭行业工人再培训和重新分配的政策，以确保公正转型；（2）增加对可持续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电动汽车和低碳供热系统的投资，并在增强连通性和公共

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加强区域合作，促进就业；（3）推动财政结构改革，协助地方政府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并实现可持续增长。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在“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会发生变化，进入中速增长，并发生重要的结构变化，表现为六个通常性特征和三个新特征。六个通常性特征：中国消费在总需求的比重将持续上升；服务业在产业结构的比重会持续上升；中国出口增速将放缓，但出口结构会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品比重将会上升；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减少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个新的时代特征：数字经济；全球化经历冲击；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

“十四五”期间，要建立绿色发展的基本架构：习近平主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要算总账，全面考虑传统工业发展成本以及绿色发展的收益，绿色发展是合算的、有竞争力的；拓展绿色发展的概念，从治理污染到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投资、绿色创新的绿色体系；转换创新和发展方式使绿色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三个重点领域包括绿色城镇化、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消费。此外，在绿色复苏中，一定要强调绿色的新基建，支持绿色就业，发放绿色消费券鼓励消费绿色产品和服务，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绿色复苏。

乔纳森·潘兴

威廉与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主任、美国国务院气候变化问题前特使

疫情背景下，全世界都为经济复苏做出了大量努力。分阶段而言，第一个阶段侧重救助个人、社区和中小企业；第二个阶段聚焦管理经济

的反弹。美国、中国和欧洲都提出了规模空前的刺激计划。相关决策应有前瞻性，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同时，对下一次危机作出预防性安排，制定一揽子的绿色激励措施和绿色就业措施，避免回到发展的老路上。比如，如何应对中国额外城镇化发展及煤炭反弹预期带来的大量新增碳排放和资产搁浅风险；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经济体系以产生高质量就业机会，解救四千万失业的产业工人，气候危机的严峻性绝对不逊色于新冠疫情，人类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对现在、对未来都至关重要。

邹骥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各行业和企业停摆、衰退，同时也是化危为机、重置经济的好机会。符合绿色低碳标准的刺激措施，将有助于加速结构性的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和中度老龄化社会，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人口红利丧失、边际效益递减和环境压力倍增的困境，而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对安全、健康、舒适性、幸福和公正平等美好生活的向往或有效需求与日俱增，需求与供给将同步出现结构性变化。国民财富的内涵和外延也伴随着人民需求的演变而迅速发生变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构成将发生变化，自然资本占比将上升，绿水青山将更是金山银山。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面临根本性的转换，亟需形成“围绕自然资本谱写新的增长故事”的共识，要设定刺激经济政策的严格绿色标准，由高投入、高环境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绿色低碳的智慧型增长方式，实现以信息技术和能源产业革命为代表的“双增效”。同时，应打通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体制机制通道，包括设定更有力度的环境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改革目标的分配管理方式以合理配置相关主体的责权利，以设置目标和目标分解为前提推动自然资产的产权化、上市交易和市场定价，以解决市场主体及地方政府增加绿色低碳投资的激励不相容问题，从而引导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以合理市场收益预期为基础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投资力度，切实通过市场机制把绿水青山兑现为金山银

山，把绿色低碳的外部社会效益内化为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内部经济效益。这应当纳入“十四五”时期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的重要议程。

韩佩东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中国正在进行老龄化社会的深刻转型，同时，技术和新经济带来巨大潜力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机会。我们一方面面临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很难回到疫情前的状况，但另一方面，这也坚定了我们打造新的韧性发展路径的决心。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当前也面临着重要的政策选择。中英欧之间在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绿色金融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合作机会，应共同为全世界的绿色低碳转型做出贡献。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疫情不仅改变了“十四五”的出发点，更造成“十四五”宏观环境重大调整，在经济总量和结构上产生持续冲击。

外部环境上，世界经济长期停滞步入加剧期，世界老龄化、高债务率、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逆全球化、技术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递减、地缘政治的恶化和大国冲突等2008年以来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在疫情期间持续加重，使我们的增长速度、利率水平、债务水平可能更加恶化。内部环境上，低增长带来低排放，冲击高耗能、高成本的行业，能源需求发生变化、能源价格低迷，利益结构变化、增长低迷的状况可能使地方政府在无法承受成本的过程中出现违规行为。

经济复苏坚持规则化和法制化，坚持环保标准、绿色标准不动摇很重要。最近一揽子改革计划出台和民法典的即将推出都是坚定新发展观念的证据，应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开放化和法制化，进入更高水平、更高阶段。

祝宝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不应低估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全球经济很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十四五”中国不应该再去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

疫情会改变全球产业链，并可能制约全球绿色发展。一方面未来五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将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影响未来绿色低碳、公共产品的合作。另一方面各国可能推动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的“回流”和“保护”，在供给侧增加了科技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成本。

在此背景下，各国合作和有效应对至关重要，“十四五”应聚焦城市群、都市圈，绿色发展，新基建、产业数字化等发展领域，将政策落实到细节。要进一步深化开放，在边际上、细节上应作出一些调整，比如开放里的“三零原则”；要强化短期和长期、需求端和供给端的结合，下一步投资应更多的投向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领域，避免大规模的刺激钢铁、煤炭、水泥等传统行业。

王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绿色转型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绿色的程度”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且不断从量变到质变。随着疫情应对的常态化，我们需要把短期绿色刺激方案整合到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并梳理和选择成本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有效降低绿色转型的制度成本，促进形成绿色要素及产品的定价机制。同时，绿色刺激方案也是一揽子综合措施，需要面向未来，综合考虑绿色评估、绿色标准、绿色设计与制造、绿色新基建、绿色消费和绿色金融，鼓励颠覆性绿色技术创新，要多点结合、系统发力。

关于“十四五”绿色发展目标指标，一是要制定具有延续性和力度且兼顾效率、总量、质量和结构指标的“十四五”绿色目标体系，并在目标范围和优先度上作出灵活安排，合理扩大指标范围。

二是对现有指标进行优化，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替代能源消费总量指标，并优先制定总量控制制度，以推动重点地方和行业的碳排放达峰行动。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并未与能源消费脱钩，控制碳排放总量即限制了化石能源增长，又鼓励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使用。

三是在约束性指标执行手段上，采取更加灵活和激励机制，例如采用区域间指标交易、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横向补偿等灵活机制，并注意这些机制的相互结合，同时，配合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监管措施。

四是在国际承诺方面，在确保实现NDC目标的基础上，考虑通过拓展NDC范围来提高力度，探索纳入绿色刺激方案、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适应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绿色金融等灵活性指标和措施的可行性，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

徐林

中美绿色基金会董事长

中国能源消费仍将持续增长，而要解决消费增长带来的能源供给和排放问题只有两条出路：第一，不断提高节能水平，包括进一步加强好的节能技术的普及和利用，特别是建筑领域、制造业领域的节能。第二，坚定进行能源结构调整，特别是要加大力度在更广泛的范围开展基于清洁电力供应的电能替代，充分挖掘风电和太阳能的潜力，降低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这样有利于保障中国能源安全，同时也可以提高非化石能源比例，有效改善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带来的碳排放，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本·滨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顾问，前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疫情对“十四五”规划带来重大影响，相关技术及价值偏好正在发生深远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审“十四五”初期的一些基本假设，保持战略清晰度并考虑技术可达性。除了投资策略，财政政策和消费也是“十四五”的重要内容。应考虑可持续投资和高质量发展的资金来源，要有明确的公共财政安排。同时，要超越狭隘的气候技术交流，要在政策交流中充分考虑阻力，以跑150米的姿态去参加百米竞赛，制定多范畴的交流策略，这将有利于达成共识。比如中国的部分地方政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财政承受能力有限，要在充分考虑其经济水平的情况下推动低碳发展。

卡梅隆·海浦伯恩

牛津大学史密斯学院环境经济学教授兼主任

我用一个比喻来谈凯恩斯模式和绿色模式在经济刺激方面有何不同：即使是挖个地洞，再把地洞填上，这也是让人们复工的有效方法；而绿色刺激要再超越一步，我们不光挖个洞，还要种上树，再把洞填上。用理性的、策略性的方式来刺激政策，而且对未来产生影响。

据调查，五种政策可促进经济与气候双赢：1) 清洁的基础设施投资，2) 提升建筑能效，3) 教育和培训投资，4) 自然资源投资，5) 清洁技术研发和推广。各种研究指出，战略导向正确、培养健康的劳动力并使其具备良好技能、建立数字经济等措施对经济复苏有重要推进作用。经济学家经常要谈取舍，但其实很多方面是可协调一致，实现多赢的。